

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的防御性及相关问题

夏保国

〔关键词〕夏家店下层文化 聚落 防御 功能

〔内容提要〕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台地型聚落、城址和山冈型石城址为典型聚落形态,这两类形态都具有比较强的防御性,但其防御功能有强弱之别,可将两者区分为平战错时使用与战时战略使用的配置关系。以此为出发点,本文还简要讨论了战争所反映的社会内部矛盾以及防御设施的文化来源等问题。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11)04-0035-06

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国北方青铜时代早期的一支极其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大体为公元前2000~前1400年,历时五六百年之久。回顾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研究历程,自上个世纪30年代发现其遗存算起,有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已达80年,经过调查和发掘的聚落址超过2000处。

单就聚落考古而言,几十年的研究主要是确认了三类形态的聚落或聚落群,并对它们所反映社会结构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探讨。第一类是山冈型石城址和石城址群,这类研究以20世纪60年代徐光冀先生调查和试掘阴河、英金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为发端,他首次进行了石城址等级和以大、中型城址为中心的多层次城址群的探索^①;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张忠培先生主持下,赤峰考古队开展了半支箭河中游的大规模区域考古调查,在该流域聚落群的聚合关系上提出了相当重要的认识^②。第二类是台地型(含坡岗型)大、中型聚落,20世纪70年代刘观民、刘晋祥等先生主持了敖汉旗大甸子的发掘,率先确认该文化遗址的夯土围墙,并揭示出一片基本完整的大型墓地^③,从而展开了对该文化内部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与中原文化关系的深入探讨。第三类是小型遗址,尤其是在半支箭河区域考古调查中有关山冈和坡岗小型遗址的研究,为逐步理清它们与大中型石城址、台地型聚落和城址的配置关系提供了可能。

最近几年,随着赤峰市三座店水利枢纽工程的施工,初头朗镇三座店遗址^④、上机房营子遗址^⑤、砚台山遗址,以及二道井子遗址和墓地^⑥的考古发掘,为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崭新材料,为阐释和论说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发展进程的阶段性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

王立新先生依据所处地形将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分为三种类型,他所指称的坡岗型和平地土丘型遗址的聚落大多具有文化堆积厚、房屋建筑形态多、房屋与院落结构复杂等比较强的共性,最终都呈现为居于周边坡岗小型遗址和聚落群的中心,或者背靠山冈而前凸于平原与河谷要津的台地形态。目前已经发掘的敖汉大甸子、建平水泉^⑦、北票丰下^⑧、宁城小榆树林子^⑨、阜新平顶山^⑩、赤峰西道点将台^⑪、赤峰蜘蛛山^⑫、建平喀喇沁河东^⑬、赤峰四分地东山嘴^⑭和喀喇沁旗大山前^⑮、赤峰二道井子,以及经过调查的库伦、奈曼的城子地、北城子地^⑯等,大多属于此类,我们将之统称台地型聚落、城址。

这类聚落从面积、规模上可以初步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以大甸子遗址为典型代表,其聚落形态包括面积约为7万平方米的城址和城外1万平方米的大型墓地。据城外墓地

〔作者简介〕夏保国,男,1969年生,高级编辑,历史学博士,现为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科研博士后,邮编510275。

的区域等级与城内房址地势分野及其出土陶器类型分析,显示出在城里各个集团、各家族按照贵贱、富庶程度分区聚族而居,与墓地分区、分茔域下葬相对应关系的线索。而且,围绕这个中心城址约 1.44 平方公里范围内又有 8 处聚落环绕,在城外西北还有一处墓地,这些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第二个等级则以二道井子为典型代表,其面积在 3 万平方米左右;其城址外围也发现了墓地。面积在 1 万平方米以下的,则为第三个等级。在房址密度大体相同的情况下不同面积的聚落与其相适应的人口规模有密切的相关性,体现的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也是不同的,这应当是划分等级的依据。有学者认为,在这三个等级之上极有可能存在更大面积、更高等级的聚落^{①7}。就目前所知,有关库伦旗南泡子崖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调查显示出其作为台地型聚落的面积之大超过了大甸子城址^{①8}。这处遗址位于南泡子崖村内及其西北面,呈南北向,南北长约 1 公里,东西宽约 0.5 公里,地势北高南低,西侧有下养畜牧河自南向北流去。村内有一深沟,沟深约 6 米、宽约 20 米、长约 2.5 公里许,沟壁如同陡峭悬崖,明显将遗址截为两个部分:南半部地势较低,采集文物多为陶罐、陶壶、陶鬲、陶豆、陶纺轮、玛瑙块及铜器、石器、人骨架等,显然属于墓地;遗址北半部地势较高,坡地向阳,陶片、鬲足、鼎足、石器等遗物俯拾皆是,当属于居住址。可见,这处遗址是由城址和墓地两部分组成,其间的深沟当为城址的壕沟,有无城墙尚需进一步的工作。仅从深沟长度和遗址的整体面积来判断,很可能是一个大型城址,面积有可能达到 10 万平方米以上。

我们要着重讨论的是台地型聚落的防御性问题。具体而言,台地型聚落的外围防御设施有多种配置形态,第一种是既有城墙也有环壕,第二种是仅见环壕。显然,台地型聚落是否形成城墙与环壕的结合,可能取决于自然环境的特殊性,以及是否能够与周边聚落构成一个防御上的联动体系。只营建环壕或者利用人工沟堑、自然沟堑所能起到的防御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低于城墙与环壕相结合的防御功能的。而大山前遗址 7 个地点,尽管只在第 1 地点发现了圆台外围的土墙,但诸地点之间的沟堑又构成共同利用的防御体系,实际是具有联动性防御功能的聚落群。至于城墙的厚度、高度和环壕的深度、宽度,三个等级的聚落应当也有

相应的差别,因为聚落面积大小不同则与之相适应的人口规模也当不同,加之所处环境的差异,营建城墙的厚度和环壕的深度也当体现这种等差,实际上也与防御性的强弱有关。比如大山前第 1 地点圆台现存面积 16000 平方米,估计聚落使用时期当在 2 万平方米以上,其外围土墙基宽 10 米左右,而第 1 地点和第 2 地点之间的沟深可至 10 米,当与今天作为自然村间交通道路而对原来遗迹有所破坏有关;二道井子城址面积 2700 平方米,城墙基宽接近 10 米,壕沟深约 6.05 米。城墙的建筑方法最初为先挖隆起于地面的梯形生土墙,进而在其两侧堆土包砌,使墙体的厚度、高度不断增加。城墙外侧坡度陡峭,与环壕内壁相连形成统一的斜面,城墙顶部至环壕底部落差达 12 米。由此我们认为,单就配备了土围墙的聚落、城址而言,面积大体相当的聚落、城址的墙基宽度或许应当大体相当,壕沟的宽窄、深浅与之也应存在某种配比关系。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不考虑聚落的城墙营建方式的不同。实际上,台地型聚落、城址的城墙有的是夯土墙,比如大甸子,有的是生土挖成的,比如二道井子,还有的是部分墙段外包石墙者。这些营建方式除了自然环境的因素之外,是否在技术因素上有时代差异,目前尚难遽论。

台地型聚落、城址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绝大多数的文化堆积都十分丰厚,有的竟达 10 米以上的厚度,聚落内的房址层层叠压,形成了生活面不断抬高的纵向格局。比如二道井子聚落城址堆积深厚,个别探方内文化层相互叠压达 20 余层。以 T1707、T1708 北壁剖面为例进行观察,其大体划分的五个层位代表了不同的五个时期,在这个剖面上的 F45 - F14B - F14A - F9 四座房址是在原地由早及晚依次营建的。而且早期房屋在废弃时,往往作为晚期房屋的地基来使用。这种营建方法的大范围使用势必造成当时整个聚落内的活动面不断抬升,而随聚落内生活面的逐渐抬升,城墙墙体顶部与之处于同一平面,以至于部分晚期房址坐落于城墙之上了。这个现象说明当城内房址累积到一定高度之后,城墙和废弃后填实的房址就构成了一个大的台基。大山前第 1 地点似乎也存在废弃城墙的类似现象。不惟如此,二道井子聚落址内发现 F75 房址墙壁上的瞭望孔,也说明了其单体房屋可能具有碉楼的意义,更说明台地型聚落、城址本身的防御性是与时剧增的。

二

山冈型石城址是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种极具特色的聚落形态,其分布中心区域是英金河、老哈河和大凌河流域,调查和发掘工作比较多的是英金河及其支流阴河、半支箭河流域和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这些石城址因其多处于山冈、高地,并沿河岸呈带状群组分布,学界有人称其为“原始长城”。

据徐光冀先生的调查报告披露,英金河、阴河沿岸的43座石城址的分布相当密集,有些地方城址之间相距只有200~300米,而且,从西向东,明显成群分布,大概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石城址群在尹家店至三座店约20公里的范围内,发现石城址20座。其中,迟家营子的石城址最大,城内面积近10万平方米,另外两座规模较大的城址面积分别为3.8万平方米和3.3万平方米;第二组石城群分布于由初头朗至当铺地,与第一组石城群相距约5公里,约20公里的地段内发现石城址12座,规模较大的两座的城内面积分别为3.5万和2.5万平方米。第三组石城群分布于王家店至水地一带,与第二组石城群相距约25公里,约20公里的范围内发现石城址5座。规模较大的一座城内面积2.2万平方米。徐光冀先生认为这类城址选择这样的地理环境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迟家营子城址可能是整个城址带的中心。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些居于山冈上的石城址经过正式发掘的只有新店、上机房营子、三座店和砚台山,以及大凌河中游河岸高地上北票康家屯等,总计数量不过七八座,故而静态观察所见之所谓城址群组内和诸城址群组之间的各个石城址是否存在共时关系或者具有紧密关联的历时关系,都还有待于层位学和器物类型学研究获得确认。

关于石城址的规模和等级以及社会结构,杨虎先生等专家曾经以敖汉旗萨力巴乡城子山石城址为例进行分析^⑩,此处坐落在当地最高的山顶部的石城址,面积达6.5万平方米,可分为内城和外城两层。根据城内的建筑布局推测,在这里居住的人至少分为三个等级,内城是核心,主人应是全城及附近丘顶、坡地上9个小型聚落,以至更大范围人群的首领。他们认为,这个地点有比较严密的防御设施,应是高层次的城堡,亦或就是城的一种形态。显然,

这种按照城址规模来划分等级的结论如果成立的话,我们认为山冈石城址或许是与台地型聚落、城址在规模和等级上相照应的。

山冈型石城址的许多遗迹现象与台地型聚落、城址具有相同的功能。比如,将三座店山冈石城址和二道井子台地型城址的内部结构作类比可以发现,单圈或者双圈石砌房址形态、多个房址组成的院落和院落间局促的巷道,乃至部分石堆的配置等等相近相似的遗迹现象体现出了相同的防御功能。而且,这种相同的院落结构似还表现出生活在这两类聚落中的人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也很可能是一致的。但是,两者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其一,山冈石城址因其地理位置多处于沿河沟口等重要交通要道,临崖依山而筑,居高而扼咽喉的战略意义十分突出;其二,山冈石城址除了大小成群组配置外,还呈现出大小城、内外城的加强型防御体系,比如赤峰三座店石城址就是大小城的配置关系,而敖汉旗萨力巴乡城子山石城址以及承德平泉的许多城址都是内外城结构;即便如此,许多山冈型石城址外围依然有壕沟的配置,而目前所见石城墙上的原始“马面”更是只见于石城址;其三,山冈型石城堡当比台地型土墙城堡具有更高的营建难度,需要更大的工程量和更多的人力,取材的不同固然是因地制宜的结果,但其建筑材料的耐用性很强,所以山冈石城址的耐久性更强,可谓“建之不易,用之更久”。总之,这一切都说明山冈石城址防御功能大大强于台地型聚落城址。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大多已经发掘的山冈石城址内的文化堆积较之台地型聚落城址要薄得多,如赤峰三座店和上机房营子石城址内的文化堆积都不超过三层,城址中出土的陶器也不丰富。这与其周边山冈不宜农耕当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就山冈石城址而言,如此强的防御设施与如此薄的文化堆积之间形成的矛盾,则很可能暗示这样耐久的石城未必都是长期连续使用的。比如三座店石城址内在所发掘的部分探沟和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地方,发现最下层有3座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房址,居住面抹白灰,其上为石砌房址叠压,城址内还有大量双圈石砌房址。因为半地穴式房址一般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房屋形态,如果这类房址是石城址初建之后的一种房屋形态,那么三座店石城址使用的起止时间便可能很长,但其累计使用的总时段则未必长,很可能是间断性的使用的,至于

其废弃也未必是强烈的战争毁坏的结果。

三

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考古实践来看,有关该文化的研究实际上已经从确定时空框架和分析其文化谱系的阶段进入到了综合考察研究其社会组织结构和阐释其历史发展进程的阶段。从聚落考古角度观之,区域调查和典型聚落址的揭露都为通过对遗址中遗迹、遗物的形态及其共存关系(或可称之为“考古情境”^{②①})来确定聚落以及遗迹功能提供了可能,而功能分析恰恰应该是聚落考古的核心^{②①}。这个原则对于探讨不同形态的聚落之间的关系也有适用性。这样,也就提供了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关问题作出合理阐释的可能。

1. 关于台地型聚落、城址累次抬高生活面的问题,郭大顺、张星德先生认为这是缘于“固守老宅”的一种文化心理所致^{②②},以此解释并无不可,但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抬高生活面本身是与聚落不断抬升的防御功能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形成台地型聚落、城址这种格局的不得不为的客观动因大概是频繁战争,频繁的战争迫使台地型聚落、城址的居民不断加固城墙,当战争威胁达到一定程度或者说战争的一种结果可能是居民被迫离开所居住的聚落,以便坚壁清野。当其重返遭到破坏的聚落、城址,就在聚落、城址内的原有房址之上按照原有的家族和社群重新规划建设家园,从而形成了生活面的累次抬高却仍然保持着基本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的局面。因此,台地型聚落、城址至少在使用的中后期具有防御性“城堡”的性质。“城堡”内的居民既包括掌握了权柄的部族首领,也包含身兼农战之职的公社组织成员。而权贵和公社社员则分区居住和埋葬,在各自区域内则是按照家族和氏族成院落居住。显然,台地型聚落和城址是组织农业生产生活的中心城邑,不论它居于平原河岸还是坡岗前沿,都是向农业资源区展开其扇面的。

2. 欲解释山冈石城址的防御性极高和文化堆积较薄的表面矛盾,则需要与台地型聚落、城址不断抬升居住面的现象结合起来,也就是要区别台地型聚落和山冈型石城址的不同功能配置。我们认为,台地型聚落、城址的居民在战时坚壁清野后的去向是山冈型石城址,据守山城以作长期战争抵抗。即是说,山冈石城址

以及石城址群以及石城址带主要是战略防御之用。因此,台地型聚落、城址和山冈型石城址以及石城址群就可能具有平战错时使用和主要为战时使用的分别。如果这个推论成立,则一个石城址群或石城址带是与某个特定区域的台地型聚落、城址配套的。因此,整个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区域居民至少可以区分为若干不相统属的以石城址群构成成为强大防御体系的亚群,若干石城址群与相关区域的台地型聚落、城址组成了一个自成系统的较大的部族群落。王立新在讨论山冈顶部的一些小型遗址时指出,从半支箭河中游的调查看,以架子山为中心的一群这类遗址,似乎是通过几条放射状的山脊而与周邻的几处坡岗型遗址相联系的。从这一点上说,它们很可能是为居住于相邻的几处坡岗型遗址中的人群所共有的。因而,这群特殊性遗址的存在,也就成为居住于周围的人群业已结为较大集团的标志。笔者的上述认识与这个判断是有联系的。

当然,位于大凌河河岸高地上的北票康家屯石城址内文化堆积具有一定厚度^{②③},这就不能排除也有平战结合使用的石城址。单就这一点来说,可能还存在介于台地型聚落城址与山冈型石城址之间的一种聚落类型。

3. 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有关“原始长城”以及夏家店下层文化所面对战争性质的认识。承认山冈型石城址的“城堡”性质是毫无疑问的,有学者指出不能将“原型”理解为长城的基础或者直接渊源,也是对的;但有的学者说这样的城堡带因其处在游猎文化与定居的农业、半农业文化的交界地带^{②④},所以夏家店下层文化所谓城堡带的防患对象就是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游猎文化族群,这似乎有论说过勇的嫌疑。有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存中,早期遗存具有较为明显的细石器特征^{②⑤},晚期则大为逊色。可见,如果石城址带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长期防范本文化区域外的游猎劲敌,那么所谓外来劲敌体现在考古学遗存也应该是比较明显、丰富、持续的,可是现在却完全不能确认这样一个“原始长城”之外的劲敌。还有研究注意到在北票康家屯石城址中见有来自长城地带的花边高系统遗物,说明有长城地带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因素的渗入,但是这种渗入不可能是长期敌对性的侵入,因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如若真是构成了本区域一体化的强大防御体系,来自于其他

文化的侵扰也就不可能轻易到达该文化的腹地^{②6}。另一种对夏家店下层文化高防御性聚落的解释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人,可能是由数个不同的氏族部落联盟所组成,但有着共同的文化相;氏族部落间的征战是经常发生的,部落间可能有着血缘关系^{②7}。我们认为这个观点颇有说服力。聚落、城址中普遍具有完备的战争防御设施说明在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区域内战争频仍,而这种战争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内部矛盾冲突十分剧烈的反映。甚至可以设想,大规模营建山城以应对频繁的内战,几近“穷兵黩武”,其结果只能是“同室操戈,惨胜如败”,可能也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衰亡的最终原因。

夏家店下层文化除了出土了青铜杖首象征着军事王权之外,还发现了8件石磬,其中两件为发掘出土的,另有6件为馆藏征集品。过去学者多将其断为礼器中的乐器^{②8}。实际上,《淮南子·汜论训》有言“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并称“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许进雄先生专门加以讨论说,石磬的最初功用是起着战争警戒之用^{②9},这是正确的。可见,夏家店下层文化战争频仍于此或可增加一个旁证。

4. 关于建造城墙和环壕相结合的防御体系的文化来源问题,杨虎先生强调围墙聚落、城址是本地区史前聚落形态发展的必然的质的飞跃,而我们认为这种防御体系的营建模式如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来源一样,绝对不是单一的本土因素的结果,它必然有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建城模式中学习而来的强大因素。因为东北地区在先史时期的环壕虽然传承有自,却完全没有建筑夯土或者挖构生土城墙的任何传统因子;相反,后冈二期文化辉县孟庄遗址和安阳后冈遗址恰恰发现了生土城墙和夯土城墙。

而且,城墙营建应当与房屋基本营建技术和方式的发展相关。夏家店下层文化台地型聚落、城址使用的时期比较漫长,有证据表明土坑半地穴房址早于夯土和土坯构筑的房址,土石混筑和石砌双圈或单圈地面式房址也不会早于土坑半地穴房址^{③0}。那么,如果存在土坑半地穴房址——夯土或土坯地面房址——石砌单圈或双圈地面式房址的建筑形式的演变序列,以此推定夯土和生土挖构的台地型聚落、城址的出现早于山冈型石城址的出现,也许不是无妄之谈。所以,正如笔者过去一再强调的,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个主要来源正是后冈二期文化^{③1},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所采用的夯土、土坯筑房乃至房屋地面铺设石灰面的技术既然都来自后冈二期文化,这些技术又与夯土或者生土挖构城墙的技术密切相关的,推定其城墙构筑技术的文化来源之一为后冈二期文化,自是可以成立的。所以,杨虎先生强调的本土因素主要应当是指环壕形态以及可能较为晚出的石砌城墙。

当然,有关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聚落考古还有可能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比如笔者认为后冈二期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可以和文献所谓“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相映照^{③2},而发生在二里头夏文化和先商文化、商文化间的兴替是否与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形态的变化及文化的阶段性变迁存在联系,以及所谓“以变北狄”是不是包括“以夏变夷”和“以夷变夏”两个不同的阶段,都需要更宏观也更细致的、更谨慎的论证来说明。再有,诸如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堡”与其周边存在的堆积很浅、遗物很少的小型聚落,似已形成了“国”、“野”之别^{③3},因为这只是一种平面的和静态的分析,所以我们认为所作推论不宜说得过满。

注 释:

- ① 徐光冀 《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 ② 国家文物局组赤峰考古队 《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科学出版社2002年。王立新 《试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类型与布局特点》,《文物春秋》2000年第3期。
-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大甸子》,科学出版社1996年。
- ④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赤峰市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内蒙古文物考古

- 研究所 《赤峰市松山区三座店遗址2005年度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1期。
- ⑤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年赤峰上机房营子石城址考古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08年第3期。
- 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8期;李富 《二道井子遗址惊现171座墓葬》,《赤峰日报》2010年7月11日第1版。
- ⑦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 《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2期。

- ⑧ 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 《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 1972 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 年第 3 期。
- ⑨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宁城县小榆树林子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5 年第 12 期。
- ⑩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 《辽宁省阜新平顶山石城址发掘报告》，《考古》1992 年第 5 期。
- ⑪ 王立早 《西道村遗址发掘获得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1 年 3 月 31 日；刘晋祥 《赤峰市点将台青铜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 年），文物出版社 1992 年。笔者有幸在大学本科期间参加了该遗址的发掘。
- 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 年第 3 期。
- ⑬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组 《辽宁建平喀喇沁河东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11 期。
- ⑭ 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赤峰县文化馆 《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5 期。
- 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赤峰考古队 《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 1996 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 年第 9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赤峰考古队 《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 1998 年的发掘》，《考古》2004 年第 3 期。
- ⑯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李殿福 《吉林省库伦、奈曼两旗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分布与内涵》，《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 1983 年。
- ⑰⑱⑲ 郭大顺、张星德 《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 ⑳ 郝维彬 《内蒙古库伦旗南泡子崖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调查简报》，《北方文物》1996 年第 3 期。
- ㉑ 杨虎、孙祖初、邵国田 《夏家店下层文化药王庙类型城址发现与探索》，《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5 期。
- ㉒ 有关考古情境的论说可参许永杰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情境分析》，《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1 期，本文所言仅取许先生论述的大体意指。
- ㉓ 参看陈雍 《关于考古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与方法》，《文物》2001 年第 2 期；许永杰 《聚落考古在中国——历程·现状·问题》，《华夏考古》2009 年第 4 期。
- ㉔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北票市康家屯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 年第 8 期。
- ㉕ 韩建业 《试论作为长城“原型”的北方早期石城带》，《华夏考古》2008 年第 1 期。
- ㉖ 李恭笃、高美璇 《夏家店下层文化若干问题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84 年第 5 期。
- ㉗ 李维宇 《北票康家屯石城址及其相关问题》，吉林大学考古系硕士论文 2006 年。
- ㉘ 郑绍宗 《河北平泉一带发现的石城聚落遗址——兼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城堡带问题》，《文物春秋》2003 年第 4 期。
- ㉙ 李凤举 《喀喇沁旗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磬》，《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 年第 1 期。
- ㉚ 许进雄 《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 ㉛ 李维宇 《北票康家屯石城址及其相关问题》，吉林大学考古系硕士论文，2006 年。
- ㉜ 陈国庆、王立新 《内蒙古赤峰市康家湾遗址 2006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 年第 11 期。
- ㉝ 夏保国 《“流共工于幽州”的考古学释读》，《北方文物》2008 年第 3 期。

〔责任编辑 于建华〕

The Defense Function and Some Related Problems on the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in Liaoxi District Xia Baoguo

Two typical kinds living site of the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were found: the sites in plain, city and stone city in mountains. Both of them were defensive. One kind was used both in normal time and the war-time, the other was only used in wartime for defensive purpose. The paper studied something about the social problems of war and the cultural origin of those defensive installations.